KHARISMA: JURNAL ILMIAH TEOLOGI
Vol. 7, No. 2 (2026): 107–124 ISSN: 2722-6441 (online), 2722-6433 (print)
Diterbitkan: Sekolah Tinggi Teologi Kharisma, Bandung http://jurnalsttkharisma.ac.id/index.php/Kharis/

Niut Sa'e 作为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光照下的安慰

Petrus Christologus Dhogo[1], Petrus Efriem Foni[2], Vinsensius Mario Wilem[3]
Institut Filsafat dan Teknologi Kreatif Ledalero
通信作者：cidifoni@gmail.com

摘要

本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的光照下，探讨北中帝汶道湾（Dawan）族群Niut Sa'e传统中的安慰与盼望。Niut Sa'e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经验：人们相信逝者借由在世之人显现，并向家人传达信息。本研究运用史蒂芬·B·贝文斯（Stephen B. Bevans）的处境神学，特别是人类学模式与实践模式，使文化经验与基督教信仰展开对话。研究发现，Niut Sa'e是家属表达哀伤、思念、悔恨及未解关系问题的象征性空间；而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则将基督徒的安慰建立在基督的死与复活，以及与主同在的盼望之上。两种视角之间的对话是批判性与处境化的，而非神学上的等同或取代。

关键词：Niut Sa'e；安慰；盼望；处境神学；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

引言

死亡是人类普遍的经验，然而对失丧的理解，却由一种文化中的语言、仪式、社会关系与信仰视域所塑造。[1]当代关于哀伤的研究表明，哀悼仪式有助于家庭表达失丧之痛、获得群体的支持、维系与逝者之间的象征性联系，并在死亡之后重建生活秩序。[2]在帝汶社会中，包括道湾族（Dawan）即 *Atoni Pah Meto*（意为"旱地之人"）的社会，死亡经验亦涉及人、家庭、先祖与宇宙秩序之间的关系。[3]因此，丧葬仪式不仅具有礼仪性功能，也是赋予失丧以意义、维系社会与灵性关系延续的文化途径。[4]

这一向度体现于 *Atoni Pah Meto* 的世界观之中。正如阿菲（Afi）与巴南图安（Banamtuan）通过对 *Poitan Liana* 仪式的研究所显示的，该世界观将人的生命置于与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的关联之中。亲属关系、*Atoin Amaf*（家族长者）的角色，以及对 *Uis Neno*（天神）、*Uis Pah*（地神）和先祖的信仰，皆通过仪式行动与象征得以表

[1]Hoang Le et al., "Mourning Rituals Impact Grief Outcom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 Mixed-Methods Review," Death Studies 49 (2025): 1–12, https://doi.org/10.1080/07481187.2025.2561079.

[2]Jacques Cherblanc et al., "Rituals in Grief: Why Meaning Matters More Than Numbers,"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30, no. 6 (2025): 871–892, https://doi.org/10.1080/15325024.2025.2471816.

[3]Kristian E. Y. M. Afi dan Maglon F. Banamtuan, "Kajian Sosio-Historis tentang Pandangan Dunia Atoni Pah Meto dalam Ritus Poitan Liana," Paradigma: Jurnal Kajian Budaya 10, no. 1 (2020): 49–58, https://doi.org/10.17510/paradigma.v10i1.335.

[4]Susana de Matos Viegas, "The Co-Presence of Ancestors and Their Reburials among the Fataluku (Timor-Leste)," Indonesia 107 (2019): 55–73, https://doi.org/10.1353/ind.2019.0004.

达。[5]在这一文化框架中，死亡不应仅被理解为个体生命的终结，而应被理解为一桩影响家庭与群体关系的事件，它要求对这些关系进行意义的诠释与重新整顿。

在道湾社会的哀伤处境中，*Niut Sa'e*（逝者借在世者之身传话的习俗）是一项值得研究的实践，即已故者通过某位在世之人临现，并向家人传达讯息的经验。这种经验可能涉及尚未了结的事务、亲属关系，亦可能关乎家庭在面对失丧时对明晰与安宁的需要。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证实或否定逝者与在世者之间字面意义上的沟通是否可能，而在于依据践行者的意义诠释，将 *Niut Sa'e* 理解为一种文化与象征性的经验。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在于：*Niut Sa'e* 如何在哀伤经验中发挥安慰实践的功能，其意义又如何能与关于死亡、安慰和盼望的神学视角展开批判性对话？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为了使研究不止步于对某一传统的描述，而能进而评估其牧养意义、其对陪伴哀伤家庭的可能贡献，以及在基督教信仰光照下对其进行诠释的界限。

关于道湾族丧葬仪式的研究表明，哀悼实践的向度远比单纯的悲伤表达更为广阔。对 *kulut kaet*（死亡哀歌）的研究显示，道湾社会中的丧葬哀歌关乎失丧的表达、对逝者的尊崇，以及群体生活中的社会与宗教向度。因此，道湾社会的死亡经验无法脱离个体、家庭、群体与文化所传承的信仰之间的关系。[6]这一视角对 *Niut Sa'e* 研究十分重要，因为它表明道湾社会的死亡经验具有关系性与群体性的向度，可成为理解安慰之意义的切入点。

除了关于道湾的研究之外，处境神学的研究也为文化经验与基督教信仰的相遇提供了基础。贝文斯（Bevans）将人的处境与文化视为神学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要素。神学并非诞生于真空之中，而总是面对人的具体经验，并须考量信仰得以活出的处境。[7]在印度尼西亚的处境中，这一进路使人得以认真地解读文化实践，既不必立即拒斥，也不必不加批判地接受。关于印度尼西亚处境神学与文化的研究也表明，本土传统、群体经验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对话，可以成为构建更具处境性的神学理解的空间。例如，努格罗霍（Nugroho）与普拉莫诺（Pramono）展示了死亡处境中的文化实践如何能够借由贝文斯的处境神学模式加以解读，并与基督教信仰对话。[8]

然而，上述关于道湾社会的研究与关于处境神学的研究，仍留有需要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阿菲与巴南图安的研究主要通过 *Poitan Liana* 仪式阐明 *Atoni Pah Meto* 的世

[5]Afi dan Banamtuan, "Kajian Sosio-Historis," 50.

[6]Rudolof Jibrael Isu et al., "The Religious Meaning of 'Kulut Kaet' (Mourning Lament) in Dawan Ethnic in Nusa Village in East Nusa Tenggara: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Study," E-Link Journal 12, no. 1 (2025): 95–102, https://doi.org/10.30736/ej.v12i01.1252.

[7]Stephen B. Bevans,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ed. rev.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2).

[8]Y. Nugroho dan T. Pramono, "Pendekatan Kontekstual terhadap Tradisi Peringatan Kematian dalam Pelayanan Pastoral di Gereja Gladagsari, Boyolali," *Immanuel: Jurnal Teologi dan Pendidikan Kristen* 7, no. 1 (2026), https://doi.org/10.46305/im.v7i1.608.

界观，而关于 *kulut kaet* 的研究则关注道湾丧葬传统中的哀伤表达。与此同时，处境神学的研究多半探讨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一般关系。由此可见，仍有空间更为具体地使 *Niut Sa'e* 传统、死亡中的安慰与盼望的经验，以及圣经关于死亡与基督教盼望的见证彼此相遇。这一研究空白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当 *Niut Sa'e* 被置于道湾基督徒的生活处境中时，这一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置身于社会之中的教会，所面对的并非脱离文化背景而经历死亡的人。哀伤中的基督徒家庭带着塑造了他们理解死亡方式的语言、象征、记忆、亲属关系与文化实践。因此，关于死亡的神学反思，仅仅重复有关死后生命的教义是不够的，还须倾听信众在自身文化中如何具体地经历失丧。从处境神学的视角看，文化可以成为信仰反思过程中被倾听并受到批判性分析的处境，而圣经与基督教传统在这一过程中仍具有规范性的作用。[9]例如，关于达雅克·敦忠族（Dayak Tunjung）宇宙观的研究表明，一种本土世界观如何能够借由贝文斯的综合模式与基督教教义对话，而不消弭两种来源各自的独特性。[10]

正是在这一框架下，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显得尤为重要。这段经文产生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对已经去世的信徒心怀不安的处境。保罗并未忽视哀伤的经验，而是将其引向根植于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盼望。已经去世的信徒并未被视为处于上帝救恩工作之外。相反，保罗确认他们在基督里复活，并确认信徒与主同在的团契。因此，这段经文中的安慰并非建立在否认悲伤之上，而是建立在以基督为中心的末世盼望之上。[11]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这段经文的结尾，即保罗吩咐教会用这些关于盼望的话语"彼此劝慰"。由此可见，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中的安慰兼具神学与牧养的向度。安慰并不意味着消除失丧的经验，而是为死亡提供信仰的视角，使悲痛不至于终结于绝望。基督教的盼望建立在这样的确信之上：基督已经死而复活，并且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将分享上帝所应许的生命。[12]

在这一点上，*Niut Sa'e* 与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之间存在重要的对话空间。在人类经验的层面，二者都面对失丧、对逝者的思念、对安慰的需要，以及在死亡之中

[9]Ebenhaizer I Nuban Timo dan Bobby Kurnia Putrawan, "The Bible in Contextual Theological Work in Indonesia," Quaerens: Journal of Theology and Christianity Studies 3, no. 1 (2021): 1–24, https://doi.org/10.46362/quaerens.v3i1.24

[10]Yohanes Damianus, "Dayak Tunjung Cosmology and the Theology of Communio Sanctorum: An Exploration of Contextual Theology in Synthetic Model of Stephen B. Bev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onesian Philosophy & Theology* 1, no. 1 (2020), https://doi.org/10.47043/ijipth.v1i1.5.

[11]Charles A. Wanamaker, *The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0), 164.

[12]Gordon D. Fee, *The First and Second Letters to the Thessalonians*,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9), 164-181.

对意义的寻求。*Niut Sa'e* 可以成为一个文化空间，使家人得以表达思念、传达讯息、重新忆念与逝者的关系，并化解尚未了结的关系性难题。与此同时，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则提供建立在对基督的信仰、复活，以及与主同在之盼望之上的安慰。然而，二者不能简单地等同。*Niut Sa'e* 中的安慰植根于道湾社会文化意义的结构，而保罗的安慰则植根于基督的死与复活。因此，本研究所进行的对话，并非勉强寻求相同之处，而是解读可能的交汇点，同时辨明其神学上的界限。

恰恰是这种差异使对话变得重要。*Niut Sa'e* 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人如何经历失丧，与逝者的关系如何被理解，家庭又如何找到处理悲伤的空间。反过来，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则提供以基督为中心的、关于安慰与盼望的神学视域。如此，本土传统不被置于福音的位置之上，圣经经文亦不被用来抹去群体的文化经验。二者被置于批判性的对话之中，使人在文化中的经验得以被倾听，而基督教信仰则为这一经验提供神学的导向。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北中帝汶县道湾社会 *Niut Sa'e* 传统中的安慰与盼望，如何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的光照下得到反思？这一问题围绕三个主要焦点展开：第一，理解 *Niut Sa'e* 在道湾社会死亡经验中的意义；第二，辨识该传统中所呈现的安慰与盼望的向度；第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的光照下反思这一意义。本研究无意断定社会关于逝者临在的信念孰对孰错，而是力求理解这一经验在哀伤家庭生活中的意义与功能。据此，本研究论证：*Niut Sa'e* 可被解读为一个文化空间，家庭在其中处理失丧、思念、记忆与关系；而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则提供根植于基督的死与复活的基督教安慰与盼望的视域。期望二者的对话能开启神学反思的空间，既尊重道湾文化的丰富性，又持守基督教盼望的独特性。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处境神学为进路，旨在理解 *Niut Sa'e* 传统在道湾社会中的意义与功能，并使之与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所述的基督教安慰与盼望展开对话。之所以选择处境神学进路，是因为本研究不仅意在描述文化现象，亦意在进行神学反思，将社会的具体经验与基督教信仰的见证联系起来。具体而言，本研究运用了贝文斯（Stephen B. Bevans）的两种处境神学模式，即人类学模式与实践模式。人类学模式用以从道湾社会的意义世界内部理解 *Niut Sa'e*，将文化视为在神学建构过程中需要被倾听的人类经验之源。实践模式则用以将 *Niut Sa'e* 中所包含的悲痛、和解与关系修复的经验，与对基督教关于死亡、复活及在基督里的盼望之信仰见证的批判性反思联系起来。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包括原始资料与二手资料。原始资料为圣经文本，尤其是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它是理解基督教面对死亡时的安慰与盼望的神学基础。二手资料包括关于 *Atoni Pah Meto* 世界观与文化、死亡传统与 *Niut Sa'e* 现象的文献，贝文斯的

处境神学，以及戈登·D·费（Gordon D. Fee）与查尔斯·A·瓦纳梅克（Charles A. Wanamaker）关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圣经研究。资料收集通过对奥埃塞纳村（Oesena）的传统长者阿洛伊修斯·宾萨西（Aloysius Binsasi）先生的电话访谈（他对 *Niut Sa'e* 知识渊博）与文献研究法进行，即阅读、辨识并分析与研究焦点相关的各类文字资料。这一方法使研究者得以深入而全面地考察 *Niut Sa'e*、悲痛、安慰、盼望、基督的复活以及与主同在的生命等主要概念。

资料分析经由若干相互关联的阶段进行。第一，研究者依据人类学与文化文献，描述道湾社会的意义世界与 *Niut Sa'e* 传统。第二，研究者分析 *Niut Sa'e* 作为家庭中处理悲痛与修复关系之空间的功能。第三，研究者从神学与牧养的角度诠释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以理解基督教安慰与盼望的根基。第四，研究者通过批判性对话，比较 *Niut Sa'e* 与圣经文本之间的交汇与差异。第五，研究者构建处境神学的综合，作为在道湾文化处境中牧养基督徒的基础。经由这些阶段，本研究无意证实或否定 *Niut Sa'e* 中的超自然实在，而是分析社会赋予这一经验的意义与功能，并将其置于与基督教信仰的对话之中。

研究结果与讨论

Niut Sa'e 作为道湾社会丧葬传统中的安慰实践

Niut Sa'e 在道湾社会意义世界中的位置

Niut Sa'e 须首先从践行它的社会之意义世界内部加以理解。在 *Atoni Pah Meto* 的处境中，人的生命并非与社会关系、自然、先祖及超自然实在彼此分离。阿菲与巴南图安对 *Atoni Pah Meto* 世界观的研究表明，社会生活是在与 *Uis Neno*、*Uis Pah*、先祖以及社会与宇宙的秩序之关系中被理解的。[13]由此，人的经验不仅被置于经验的空间之中，也被置于将人与超越自身的实在相联结的关系网络之中。

这一框架对于解读 *Niut Sa'e* 十分重要。这一实践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关于逝者的现象，或是关于与逝者的沟通是否真实发生的问题。对本研究而言，更为相关的问题是：*Niut Sa'e* 的经验对正面对死亡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在这一处境中，*Niut Sa'e* 可被理解为一种象征性的经验，社会将其诠释为逝者通过某位在世者而临现。通过这一经验，某些讯息得以传达给家人，尤其涉及家庭关系、爱、道歉、未了结的事务、责任，或临别的话语。[14]

这样的解读与贝文斯的人类学进路相契合。人类学模式将人的经验与文化视为神学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要素。对贝文斯而言，处境神学不应仅仅从外部带来一种神学

[13]Afi dan Banamtuan, "Kajian Sosio-Historis," 50.

[14]Aloysius Binsasi, wawancara oleh penulis melalui telepon, September 2026.

表述，再将其套用于某一文化，而应关注生活于特定社会与文化处境中的人的经验。[15] 因此，在给予神学评价之前，*Niut Sa'e* 首先须被当作道湾社会具体经验的一部分来倾听。

在这一框架下，*Niut Sa'e* 具有强烈的关系性向度。与逝者相关联的讯息，不仅涉及逝者个人与在世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往往还关乎家庭之间的关系。道歉、财产问题、亲属之间的冲突、尚未了结的责任，乃至爱的表达，皆表明死亡可以重新开启那些在生前未获解决的关系性难题。由此，*Niut Sa'e* 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空间，用以表述此前未曾说出之事。

这一向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安慰并不总是以劝告或鼓励之言的形式出现。当哀伤者获得空间去表达失丧、思念、悔恨，乃至与逝者之间尚未了结的事务时，安慰便得以发生。在这样的处境中，*Niut Sa'e* 可被理解为社会为悲痛经验赋形的一种文化方式。这一实践并不消除死亡，也不会自动抹去悲伤，却为家庭处理失丧经验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空间。

*Niut Sa'e*作为哀伤的处理空间

从安慰的角度看，*Niut Sa'e*的要义主要不在于这一实践能否提供有关逝者处境的信息，而在于这一经验中所呈现的关系性与情感性功能。当家人领受到被理解为来自逝者的讯息时，便获得机会去表达逝者在世时或许未能说出的话语。因此，这一经验可以成为一个空间，使人得以言说思念、爱、悔意、道歉，以及对失去之事实的接纳。

有一则经验体现了*Niut Sa'e*作为哀伤处理空间的功能，涉及奥埃塞纳（Oesena）村法埃诺诺（Faenono）的塞尔瓦修斯·塔兰（Servasius Talan）之死。据阿洛伊修斯·宾萨西（Aloysius Binsasi）所述，塞尔瓦修斯·塔兰去世后，出现了*Niut Sa'e*的经验，家人将其理解为逝者的临在与讯息的传达。该讯息涉及此前出现问题的家庭关系。塞尔瓦修斯被理解为在提醒家人，不可让与亲族兄弟姊妹的关系继续处于不和解的状态。此后，这一讯息被接受，不仅是关于逝者的表述，也是对在世家人的提醒，要求他们重新关注已出现裂痕的关系。[16]这一例子表明，*Niut Sa'e*可以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相遇之处，使家人得以重新面对先前尚未解决的情感与关系经验。

由此可见，安慰并不等同于消除哀伤。相反，哀伤获得了得以表达和处理的空间。家人并未被迫立即忘记逝者，而是获得空间，重新安顿自己与逝者的记忆、爱，以及与其共同经历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处境中，*Niut Sa'e*的经验可以发挥象征性媒介的

[15]Bevans,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25.

[16]Binsasi, wawancara.

功能，帮助家人为失去赋予意义。安慰是通过表达关系中仍然留存之物而发生的，而非通过抹去失去的经验。

这一功能具有社会维度。若所出现的讯息涉及家庭冲突、道歉、责任的分担或尚未解决的问题，则*Niut Sa'e*的经验可以促使家庭成员重新面对关系紧张之处。在这类情形中，被理解为来自逝者的讯息可以成为契机，促使家人展开对话、道歉、解决问题或修复关系。因此，*Niut Sa'e*的安慰价值并不止于个人的情感经验，而可以延伸为家庭生活中的和解行动。在此意义上，安慰不仅是心理层面的，也是关系层面的。亲属之间关系的修复成为面对死亡之过程的一部分。

这一解读与如下理解相一致：丧葬仪式的意义并不仅仅来自仪式的频次或形式，而来自仪式为个人与群体提供空间，使其得以为失去赋予意义的能力。[2]在*Niut Sa'e*的处境中，当关于逝者临在的象征性经验成为家人表达感受、面对未了之事并重新安顿亲属关系的机会时，这种意义便显现出来。因此，这一文化实践可被解读为哀伤处理过程中的一种文化机制。

然而，这种解读须以批判的态度进行。本研究无须断言这些讯息客观上确实来自逝者。此类断言超出了这一处境神学研究的能力范围。可供分析的，是群体赋予这一经验的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性与关系性功能。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可使研究保持在学术的领域之内，而不致沦为形而上学的论证。

在处境神学的框架下，这一立场也使群体的文化经验得以被置于必须倾听并加以批判性诠释的资料之列。传统不会被直接接受为神学真理，但在其中所活出的意义得到理解之前，也不会被拒斥。以这种方式，*Niut Sa'e*可首先从群体的具体经验加以解读，然后与关于哀伤、安慰、关系和盼望的神学反思展开对话。这一进路使分析更为贴近现实，因为神学反思是从群体生活的实践出发，而不仅仅是从由外部强加的神学概念出发。

据此，对本研究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可表述如下：*Niut Sa'e*可被理解为一种安慰的实践，因为它为哀伤的家人提供了象征性的空间，使其得以表达思念、爱、悔意、道歉与告别的讯息，并解决尚未了结的关系问题。由此产生的安慰主要不在于消除哀伤，而在于为家人提供空间，使其得以处理失去，并重新安顿自己与记忆及在世家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Niut Sa'e*之安慰的力量不在于对讯息之来源的证明，而在于家人为失去的经验赋予意义，并通过对话、和解与关系修复作出回应时所发生的社会性与情感性过程。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中的安慰与盼望

基督徒的哀伤："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保罗开篇即说，他不愿教会对已睡的人一无所知，免得他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这一表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表明保罗并

未禁止基督徒哀伤。问题不在于信徒是否可以经历悲痛，而在于这种哀伤如何在基督教信仰的光照下被理解。[17]

瓦纳梅克（Charles A. Wanamaker）指出，已逝信徒的问题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末世盼望密切相关。他们的忧虑涉及主再来时已逝者所处的地位。因此，保罗的回应旨在说明：已逝的信徒并不会在主降临时所要显明的救恩中失去份。[18]

这使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具有强烈的牧养性质。保罗给出末世论的阐释，并非仅为满足教会的好奇心，而是为安慰提供根基。关于未来的知识具有牧养功能，因为它改变了群体在当下面对死亡的方式。[19]

由此可见，帖撒罗尼迦前书所描述的哀伤，与信徒不可悲伤的观点之间存在重要差异。保罗仍然承认失去的事实。所区分的，是伴随盼望的哀伤与没有盼望视野的哀伤。因此，基督教的安慰并非否认失去之感，而是将哀伤置于神作为的光照之下。

盼望的根基：基督的死与复活

保罗之安慰的根基在第 14 节中清楚可见："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这一论证结构表明，信徒对已逝者的盼望根植于基督的事件。[20]

戈登·D·费（Gordon D. Fee）强调，关于已逝信徒的确信并非孤立存在。保罗将其与耶稣死而复活的信仰联系起来。如此，基督的复活便成为对"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之盼望的根基。因此，基督教的盼望主要不是基于与逝者沟通之经验的盼望，而是根植于神在基督里的作为的盼望。[21]

当保罗的经文与*Niut Sa'e*对话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Niut Sa'e*为家人提供空间，使其通过某种讯息经历或领会逝者的临在。与此同时，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将盼望的根基置于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之上。两者同样面对失去的经验，却为安慰提供了不同的根基。

由此，二者在人的经验层面存在相遇之处，在神学根基上则存在差异。*Niut Sa'e* 出发于群体关于与逝者之关系的文化经验，而保罗则出发于关于基督之死与复活的信仰见证。

---

[17]G. Nsiah, "Reception of Paul's Eschatological Teaching in Ghana: A Contextual Study of 1 Thess. 4:13–18," *HTS Teologiese Studies/Theological Studies* 80, no. 2 (2024): art. a9065, https://doi.org/10.4102/hts.v80i2.9065.

[18]Wanamaker,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165.

[19]Nsiah, "Reception of Paul's Eschatological Teaching."

[20]Nsiah, "Reception of Paul's Eschatological Teaching."

[21]Fee, *First and Second Letters*, 170.

与主同在的盼望

第 15 至 17 节随后描绘了主的降临。主要从天上降临，在基督里已死的人要先复活，还活着的人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一段在如下宣告中达到高潮：他们将“和主永远同在”（帖前 4:17）。

据费所言，这一段的主要用意并非提供有关末世的详尽时序，而是确认已逝信徒的命运。他们在主的降临中不会失去份。相反，他们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反而被先行提及。[22]

瓦纳梅克同样将第 16 至 17 节置于教会的末世盼望之中。已逝的信徒与还活着的人同样分享主的降临。因此，保罗的盼望并不止于认为死者通过当下世界的经验与在世家人“保持联系”这一观念。其盼望的中心，是全体信徒与主同在。[23]

这就对基督教的安慰产生了重要的理解。安慰并不仅仅因为哀伤的人可以通过记忆或某种经验而感到与逝者相近。基督教的安慰具有末世论的取向：盼望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将分享与主同在的生命。

“你们当彼此劝慰”

第 18 节给出保罗全部阐述的牧养目的：“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句话表明，关于死亡的神学并不止于教义知识。这种知识必须产生群体彼此安慰的行动。[24]

在此，盼望与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得以显现。末世盼望并非忽视哀伤之人的理由。相反，盼望成为群体彼此扶持的根基。在这一处境中，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不仅可被读作论及末世将发生何事的经文，也可被读作论及基督徒群体如何在当下面对死亡的经文。[25]

因此，对本研究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中的安慰，是通过根植于基督之死与复活的盼望、信徒参与主的降临，以及对与主同在的确信而建立起来的。哀伤并未被否认，而是被置于盼望的视野之中。这一盼望随后通过彼此安慰的呼召在实践中得以落实。

[22]Fee, *First and Second Letters*, 166.

[23]Wanamaker,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167.

[24]Nsiah, "Reception of Paul’s Eschatological Teaching."

[25]Nsiah, "Reception of Paul’s Eschatological Teaching."

*Niut Sa'e*与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之间的神学对话

相遇之处：二者皆出发于失去的经验

*Niut Sa'e*与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的相遇，首先可以从共同的人类经验，即死亡与哀伤出发。*Niut Sa'e*出现于家人面对失去、需要空间来处理与逝者之关系的处境中。与此同时，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则出现于教会同样面临社群成员已逝之问题的处境中。

由此，这两种处境同样表明，死亡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死亡影响群体、关系、记忆，以及在世之人理解未来的方式。文化与神学处境的差异并不会消除这一人类经验的相遇之处。

在处境神学的视角下，这样的相遇之处十分重要。史蒂芬·B·贝文斯（Stephen B. Bevans）强调，处境神学关乎在与具体生活处境的关系中理解基督教信仰的努力。因此，只要道湾人的哀伤经验随后被置于与基督教信仰资源的批判性对话之中，这一经验便可成为神学反思的起点。[26]

相遇之处：安慰具有关系性

第二个相遇之处在于安慰的关系性。*Niut Sa'e*为家人提供空间，使其谈论自己与逝者以及与其他家人之间的关系。帖撒罗尼迦前书 4:18 同样没有以个人经验结束论述。保罗恰恰说："彼此劝慰"。[27]

由此，两种处境中的安慰都具有群体的维度。哀伤的人不被任其独自面对死亡。在*Niut Sa'e*中，家人与亲族成为处理失去经验的社会空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信仰群体则成为分享盼望、施行安慰的空间。

在此，贝文斯的实践模式便显得相关。实践模式关注具体经验、反思与行动之间的关系。[28]死亡的经验并不止于理解，而是要求群体采取行动。因此，*Niut Sa'e*与帖撒罗尼迦前书之间的对话可导向一个牧养性的问题：教会如何陪伴哀伤的道湾家庭，同时尊重其文化中处理失去的方式？

根本差异：盼望的来源

尽管存在相遇之处，这两种传统仍不可等同。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盼望的来源。在*Niut Sa'e*中，安慰涉及关于逝者通过某位在世之人而临在的经验或意义领会，以及家人所领受的讯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中，盼望根植于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保

[26]Bevans,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3-5.

[27]Nsiah, "Reception of Paul's Eschatological Teaching."

[28]Bevans,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70.

罗并未将教会的盼望建立在人能够接收来自逝者之讯息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神在基督里的作为之上。[29]

这一差异在神学对话中必须保持。若将*Niut Sa'e*直接等同于基督教的盼望，则基督教盼望的根基可能由基督转移到文化经验。反之，若不倾听*Niut Sa'e*的人性与社会功能便径直加以拒斥，则神学反思便失去了向生活于该文化中的人们作处境性言说的机会。

因此，更为恰当的进路是批判性的对话。*Niut Sa'e*可作为处理哀伤的文化经验而被倾听和尊重，但基督教盼望的根基仍须置于死而复活的基督之上。这一区分既使人得以尊重文化，又不致使文化经验取代基督教信仰的根基。

*Niut Sa'e*作为处境神学的处境场域

在这一框架下，*Niut Sa'e*可被理解为神学反思的*locus contextualis*（处境场域）。也就是说，这一实践成为一个具体的处境，关于死亡、哀伤、安慰、关系与盼望的问题在其中真实地浮现。贝文斯的人类学模式有助于神学倾听这一处境。该模式强调人的经验与文化在处境神学之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实践模式则有助于将这一经验与批判性反思及具体行动联系起来。[30]

运用这两种模式，使本文不止于探讨 *Niut Sa'e* 是否符合基督教信仰这一问题。更具成效的提问是：*Niut Sa'e* 中显现出哪些人性价值，这些价值如何与福音相遇，又在何处需要作出神学上的分辨？

由此可以发现若干可作为对话切入点的价值：对家人的爱、对逝者的敬重、对家庭关系的关注、对过失的承认、道歉、和好，以及安慰哀伤者的需要。这些价值可与基督徒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活在团契之中、彼此安慰的呼召相遇。

然而，价值层面的交汇并不等于神学上的同一。*Niut Sa'e* 经验中所包含的爱、饶恕与和好等价值，并不会自动使该实践成为基督教信仰的表达。处境神学恰恰需要保持这样一种能力，即在可以对话的文化价值与构成基督教信仰根基的神学主张之间作出区分。

解读 *Niut Sa'e* 的神学界限

除信息内容的问题之外，教会还需关注在 *Niut Sa'e* 经验中充当灵媒或中介者的人所处的位置。在这一实践中，在世之人被理解为传达逝者信息的中介。从牧养角度而言，该实践不能径直被定位为具有与信仰及教会教导同等权威的属灵真理之来源。

[29]Green, *Letters to the Thessalonians*, 45.

[30]Bevans,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55–60, 71–78.

教会需要区分两者：一是信息中可能出现的人性价值，如爱、道歉、和好、对家人的敬重以及未了事务的了结；二是关于该信息之来源或权威的主张。

因此，充当灵媒者不应被置于生者与逝者之间的绝对中保的地位，更不应成为有权决定信仰抉择、家庭生活或上帝旨意的一方。牧养陪伴应当通过倾听与对话来进行，既不羞辱也不否定信众的文化经验，同时又基于基督教信仰提供批判性的分辨（*discernment*）。若这种中介实践引发恐惧、依赖、操纵、经济索求，或取代信众对上帝与基督的信靠，教会就需要划定明确的界限。如此，教会既能肯定 *Niut Sa'e* 作为蕴含和解价值的文化经验，又不将中介实践作为教义的基础或救恩盼望的来源。基督徒的盼望始终扎根于基督，而源自该文化经验的和解价值，则可以得到陪伴，并被引向共同生活的复原。

不将文化经验转化为基督教教义

第一个界限是：*Niut Sa'e* 经验不能成为基督教盼望的教义基础。关于逝者临在之经验的见证，在赋予其意义的群体文化中自有其位置，但这种经验不能取代关于基督之死与复活的信仰见证。

就此而言，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提供了清晰的中心。保罗（Paulus）将对已死之人的盼望与耶稣已死而复活的确信相联系。[31]因此，基督教盼望的中心并非与逝者的沟通，而是基督以及上帝关于将来生命的应许。

不削弱 *Niut Sa'e* 的安慰功能

第二个界限是：神学批评不应使教会否定 *Niut Sa'e* 中所蕴含的一切人性价值。若家人在该实践中找到了表达爱、道歉、和好或化解冲突的空间，则这些方面可以成为牧养陪伴的切入点。

正因如此，实践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神学不仅抽象地追问某一实践之对错，也关注该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运作。[32]教会可以陪伴家庭，使其哀伤的处理、和好以及对丧失的接纳得以健康地进行，而不把 *Niut Sa'e* 经验当作基督教盼望的主要基础。

从"与死者沟通"转向"梳理关系与记忆"

可以发展的牧养进路，是将关注的重心从能否与逝者沟通的问题，转向该经验所具有的人性功能。如此，牧养关注便指向这样的问题：该经验是否帮助家人和好、彼此饶恕、接纳丧失并继续生活？这种重心的转移，使教会得以尊重 *Niut Sa'e* 这一文化经验，而无须将与逝者的沟通作为信仰的基础。牧养所关切的，是源自该经验的人性价值，尤其是爱、饶恕、和好、对家人的敬重以及对丧失的接纳。

[31]Fee, *First and Second Letters,* 173.

[32]Bevans,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71-78.

这种重心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消解 *Niut Sa'e* 的文化意义。相反，这一进路使教会得以用更具对话性的语言进入群体的经验。教会无须立即对全部文化经验作出评判，而可以倾听该经验的意义，进而将其带入与基督教信仰的对话之中。在这一框架下，*Niut Sa'e* 经验可以成为教会陪伴家庭处理哀伤的出发点之一，前提是该经验不被置于对上帝与基督之信仰的替代位置。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的光照下，安慰最终指向这样的盼望：在基督里死去的人将分享与主同在的生命。[33]因此，牧养陪伴可以帮助家人将对逝者的爱与记忆整合到信仰生活之中，而不把 *Niut Sa'e* 的信息或经验当作救恩的来源。基督教的安慰并不要求家人忘记逝者，而是帮助他们在对复活的信仰以及与基督同在之生命的光照下，守住这份记忆。

在实践框架中，这一进路可通过安慰礼仪与家庭祷告来实现。当一个家庭经历死亡时，神父或牧养事工者可以提供特别的时机，无论是在家庭祷告的情境中，还是在葬礼前后的陪伴过程中，使家庭成员得以表达丧失之感，为逝者的生命献上感恩，并承认悔意或尚未解决的关系问题。在会众祷告或即兴祷告的环节，可以陪伴家人表达对饶恕、和平以及继续生活之力量的祈求。在这一实践中，*Niut Sa'e* 所呈现的积极价值，如向亲人道歉并与之和好的冲动，不被视为与死者沟通的证据，而是被转化为生者之间的祷告与和解行动。这一进路根植于教会对丧葬礼仪的理解，即丧葬礼仪旨在向哀伤者带来安慰与盼望，并将逝者交托给上帝。[34]

第二种实践可以是 *Niut Sa'e* 经验之后的牧养陪伴或家庭辅导。神父、牧师或牧养陪伴者可以邀请家庭成员讲述该经验，并询问在与逝者的关系中，什么最令人困扰、最令人思念或尚未了结。若该经验带出了关于道歉或和好的信息，陪伴者无须将谈话集中于证实该信息是否确实出自逝者。相反，陪伴者可以帮助家人将该经验的意义转化为具体行动：向家人道歉、结束争吵、探访陷入冲突的亲属、完成被搁置的责任，或共同祷告以纪念逝者。如此，文化经验便不止于象征性的经验，而是在家庭生活中产生和解的实践。

在道湾社群的处境中，当 *Niut Sa'e* 中的信息涉及兄弟姊妹之间破裂的关系时，这一进路尤其可以应用。教会可以陪伴家庭，使该经验成为和解的契机。例如，在家庭讲述了含有劝人和好之内容的 *Niut Sa'e* 经验之后，牧养陪伴者可以促成一次简朴的家庭聚会：先以祷告开始，继而让冲突各方彼此倾听、道歉，并表明修复关系的决心。如此，文化信息不会成为新的属灵权威来源，而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尤其是和平与手足之情，则在基督徒之爱的行动中得以实现。处境神学的实践模式在此变得具

[33]Wanamaker, *The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169.

[34]*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2nd ed. (Vatican City: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97), nos. 1685–1686.

体：文化经验被阅读，在信仰的光照下受到批判性评估，进而被转化为给信众生活带来改变的行动。

这一进路也与教会的如下理解相符：丧葬仪式可以顾及当地群体的处境、传统、文化与虔诚，只要仍然表达基督徒之死的逾越节特质与复活的盼望。[35]因此，地方教会不必否定伴随死亡经验的全部文化元素。所需要的是批判性的分辨过程：有助于爱、和平、团结、敬重以及哀伤处理的元素，可以得到陪伴并谨慎地加以整合；而将灵媒或 *Niut Sa'e* 信息置于属灵权威或救恩来源地位的元素，则需要划定明确的界限。

如此，所发展的牧养实践，并非要直接使 *Niut Sa'e* 基督教化，而是要将这一经验中已然存在的积极价值加以净化，并引向基督教信仰的实践。教会的临在体现于：倾听信众的经验，帮助他们处理哀伤，促进和解，并将盼望引向基督。如此，*Niut Sa'e* 可以成为牧养对话的空间，使教会得以在道湾社群的文化经验与哀伤家庭的具体需要之间找到交汇点。

归根结底，从"与死者沟通"转向"梳理关系与记忆"，为教会的牧养提供了更为稳妥而富有建设性的方向。牧养的焦点不再在于证实信息的来源，而在于其在家庭生活中所结出的果子：该经验是否带来和平、饶恕、接纳与关系的修复。若这些价值得以实现，教会便可以以对话而批判的方式陪伴这一文化经验。然而，整个过程仍有其神学界限：基督徒的安慰与盼望并非源于与逝者的沟通，而是源于上帝以及基督的救赎工作。如此，对逝者的爱与记忆便可得以保存，而不致模糊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即那位死而复活、并成为信徒盼望之根基的基督。

神学综合：从哀伤经验走向盼望

基于上述对话，*Niut Sa'e* 可以为处境神学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关于哀伤的人类经验层面。这一实践表明，哀伤者需要空间来表达丧失、追念逝者、解决关系问题，并重新体验家庭中的社会纽带。在这一层面上，*Niut Sa'e* 是理解道湾社群如何处理死亡经验的重要来源。[36]

与此同时，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为这一经验提供了神学上的定向。保罗并不否认哀伤，而是将其置于盼望的视域之中。这一盼望的根基是基督的死与复活，以及与主同在的应许。[37]因此，文化经验与信仰见证可以置于对话之中，而不必将二者等同。

---

[35]*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no. 1685.

[36]L. Gibson dan D. J. Louw, "A Practical Theology of Bereavement Care: Re-Ritualization within a Paradigm of 'Comforting Presence'," *Stellenbosch Theological Journal* 4, no. 2 (2018): 521–551; L. K. Fuller, "Relearning the World: Pastoral Care in the Midst of Loss and Grief," *Journal of Pastoral Theology* 32, no. 2–3 (2022): 176–201.

[37]Nsiah, "Reception of Paul's Eschatological Teaching."

可以得出的综合是：*Niut Sa'e* 可被解读为处理哀伤的文化空间，而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则为这一哀伤之中的盼望提供基督教的视域。依此表述，*Niut Sa'e* 既不被当作基督教信仰的替代品，也不被单纯视为必须废除的实践。它可以成为教会倾听信众经验、发展处境化牧养陪伴的情境。[38]

从贝文斯（Bevans）人类学模式的角度来看，这一文化经验需要被认真倾听，因为神学总是面对特定处境中的具体之人。从实践模式的角度来看，该经验随后被带入批判性反思的过程，并由此产生牧养行动。[39]因此，*Niut Sa'e* 与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之间的神学对话并不止于概念的比较，而是归结为这样的问题：道湾的基督徒如何在尊重自身文化的同时，又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盼望，来面对死亡。

据此，本研究问题的回答可概括为三项命题。第一，*Niut Sa'e* 是一种可被理解为安慰空间的实践，因为它帮助家庭表达哀伤、爱、思念、道歉以及尚未了结的关系问题。第二，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中的安慰扎根于基督的死与复活，以及与主同在的盼望，因此哀伤并未被消除，而是被置于盼望的视域之中。第三，这两种处境可以在哀伤经验、关系、安慰与和解的层面上展开对话，但在神学盼望的来源与根基层面上不能等同。因此，*Niut Sa'e* 可以成为神学与牧养反思的处境场域（*locus contextualis*），而基督始终是基督教盼望的中心。

结论

Niut Sa'e 传统可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实践，在道湾社群处理哀伤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功能。通过这一经验，*Niut Sa'e* 成为哀伤家庭的象征性空间，使其得以表达爱、思念、悔恨、道歉与告别的信息，并化解各种尚未了结的关系问题。因此，*Niut Sa'e* 的意义不在于即刻消除悲伤，而在于其帮助家庭赋予丧失经验以意义，并重新梳理亲属之间的社会关系。

与此同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的光照下，基督教的安慰并非建立在与逝者沟通的经验之上，而是深深扎根于耶稣已死而复活的信仰。基督教的盼望指向在基督里死去之人的复活，以及与主永远同在的应许。通过这一神学与牧养的维度，哀伤并未被否认或忽视，而是被置于末世盼望的视域之中，为悲痛的群体带来实在的坚固。

Niut Sa'e 与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之间的神学反思，显示出一种批判性且处境化的对话。二者在人类面对丧失的经验、对安慰的需要，以及趋向关系复原与和解的冲动这些层面上有交汇点。然而，二者在盼望的来源与神学根基上存在根本差异。因

[38]Nugroho dan Pramono, "Pendekatan Kontekstual."

[39]Bevans,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71-78.

此，*Niut Sa'e* 可以成为尊重道湾文化和解价值的神学反思与牧养陪伴之处境场域（*locus contextualis*），而基督始终是基督教信仰盼望的中心、根基与首要方向。

参考文献

Afi, Kristian E. Y. M., & Banamtuan, Maglon F. (2020). Kajian sosio-historis tentang pandangan dunia Atoni Pah Meto dalam ritus *Poitan Liana*. *Paradigma: Jurnal Kajian Budaya, 10*(1), 49–58. doi:10.17510/paradigma. v10i1.335.

Bevans, Stephen B.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Rev. and expanded ed.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2.

Catholic Church.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Revi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fficial Latin Text Promulgated by Pope John Paul II*. 2nd ed. Vatican City: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97.

Cherblanc, Jacques, Isabelle Côté, Camille Mercure, Camille Boever, and Emmanuelle Zech. "Rituals in Grief: Why Meaning Matters More than Numbers."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30, no. 6 (2025): 871–892. https://doi.org/10.1080/15325024.2025.2471816.

Damianus, Yohanes. (2020). Dayak Tunjung cosmology and the theology of *Communio Sanctorum*: An exploration of contextual theology in synthetic model of Stephen B. Bev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onesian Philosophy & Theology, 1*(1). doi:10.47043/ijipth. v1i1.5.

Fee, Gordon D. (2009). *The first and second letters to the Thessalonians*.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Fuller, Leanna K. "Relearning the World: Pastoral Care in the Midst of Loss and Grief." *Journal of Pastoral Theology* 32, nos. 2–3 (2022): 176–201. https://doi.org/10.1080/10649867.2022.2086370

Gibson, L., and D. J. Louw. "A Practical Theology of Bereavement Care: Re-ritualization within a Paradigm of 'Comforting Presence.'" *Stellenbosch Theological Journal* 4, no. 2 (2018): 521–551. https://doi.org/10.17570/stj.2018.v4n2.a24

Green, Gordon L. (2002). *The letters to the Thessalonian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Isu, Rudolof Jibrael, Yanrini M. Anabokay, Ni Putu Juliani Lestari Dewi, Yennsy M. Fanggidae, Rocky P. Sekoni, Markus D. Radja, Temy M. E. Ingunau, and Agnes O. Manek. "The Religious Meaning of 'Kulut Kaet' (Mourning Lament) in Dawan Ethnic in Nusa Village in East Nusa Tenggara: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Study." *E-Link Journal* 12, no. 1 (2025): 95–102. https://doi.org/10.30736/ej.v12i01.1252

Le, Hoang, Ningning Zhou, John Ogrodniczuk, and Clare Killikelly. "Mourning Rituals Impact Grief Outcom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 Mixed-Methods Review." *Death Studies* 49 (2025): 1–12. https://doi.org/10.1080/07481187.2025.2561079.

Nsiah, Godfred. "Reception of Paul's Eschatological Teaching in Ghana: A Contextual Study of 1 Thess. 4:13–18." *HTS Teologiese Studies/Theological Studies* 80, no. 2 (2024): a9065. https://doi.org/10.4102/hts.v80i2.9065.

Nugroho, Yulianto, and Teguh Pramono. “Pendekatan Kontekstual Terhadap Tradisi Peringatan Kematian dalam Pelayanan Pastoral di Gereja Gladagsari, Boyolali.” *Immanuel: Jurnal Teologi dan Pendidikan Kristen* 7, no. 1 (2026). https://doi.org/10.46305/im.v7i1.608.

Timo, Ebenhaizer I. Nuban, dan Bobby Kurnia Putrawan. “The Bible in Contextual Theological Work in Indonesia.” *Quaerens: Journal of Theology and Christianity Studies* 3, no. 1 (2021): 1–24. https://doi.org/10.46362/quaerens.v3i1.24.

Viegas, Susana de Matos. “The Co-presence of Ancestors and Their Reburials among the Fataluku (Timor-Leste).” *Indonesia* 107 (2019): 55–73. https://doi.org/10.1353/ind.2019.0004.

Wanamaker, Charles A. *The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The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0.

访谈

Binsasi, Aloysius. wawancara oleh penulis, melalui telepon, September 2026.